

目 录

关于反对“罗明路线”的历史情况.....	罗 明 (1)
附件：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致福建省委的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附件二：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	
海南一角	
——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南区党组织 的活动情况.....	林克泽 (36)
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	林 仲 (53)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	庄东晓 (66)
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事略.....	黎照寰 招观海 (72)
广东折衷派画家陈树人与高剑父	黎葛民 麦汉永 (83)
著名植物学家蒋英.....	庄秋兴 (109)
记前清科举考试制度的一些概况.....	张静庐 (125)
晚清至民初广东国画界梗概.....	逸 东 (186)

中山大学前身——国立广东大学

- 沈祥龙 莫擎天 (139)
- 中山大学工作三十九年见闻..... 周鼎培 (147)
- 暨南大学回忆..... 蔡世英 (164)
- 执信中学史略..... 何 博 (174)
- 敌伪统治时期的省立广东大学..... 沈祥龙 莫擎天 (182)

广州沙面洋行话旧..... 冯翰伯 (186)

广州亚细亚火油公司忆述..... 胡毓芬 (210)

解放前广州的几种光怪陆离的行档..... 李松庵 (230)

旧社会广州尼姑庵黑幕..... 沈祥龙 (260)

· 补充 · 订正 · 质疑 ·

宋庆龄给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两封信 (279)

对第二十八辑周恩来同志进入闽西苏区的经过情况

一文中的几点意见 卢伟良 (281)

对《宋子良与西南运输处》一文的更正 冯君锐 (288)

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勘误表 (284)

关于反对“罗明路线”的历史情况

罗 明

一九三三年春，正当第四次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刚刚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二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的紧急任务，要求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决战。在这个总目标之下，赣闽两省原一、二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必须于二月二十日完成。从二月二十日起到三月二十日止，两省必须再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为此，中央局还强调必须展开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接着于二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注〕，认为省委已经“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二月二十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路线”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这样，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在福建苏区开展了起来。

同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局的代表在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对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报告，会议还作出决议，说“会、寻、安三县过去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就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还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四月十五日又在中央局的《斗争报》上发表了所谓《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的所谓“罗明路线。”因此，这场斗争由福建发展到江西，由党内发展到团内，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之中，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这场斗争已过去四十八年了，而且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作了结论。这里，我仅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一历史的回顾，以便进一步搞清我们党的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

发动这场斗争不是偶然的。当时，我任中央苏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并不是因为我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间提出了一条什么新的路线，而是因为我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一样，从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中，深切体会到只有毛主席提出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是因为我坚决贯彻了毛主席对福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所作的指示，并从当时福建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紧急措施，抵制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一

些错误做法。

他们在批判我的文章中，讲到所谓形成“罗明路线”的历史根源时，说我“在立三路线时代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说我“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说“闽西在罗明同志这一长期的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事实的真相是不是这样？现在让我从有关当时福建闽西工作的实际情况说起：

大革命开始后，福建西南部在两广区党委领导下，一九二五年五月中于厦门建立共青团的组织，一九二六年二月建立党的组织，派了两个党员去闽西工作。九月间，毛主席在广州主办的全国农讲所所有九名福建籍学员毕业，在北伐军入闽时，派回闽西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

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漳州成立闽南特委，负责领导厦门、闽南和闽西工作，我任特委书记。四月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特委在漳州厦门进行应变工作，估计事变将波及闽西，决定我和罗秋天前往闽西永定、上杭、龙岩、平和四县指导巩固发展党和农运工作。七月间党中央从武汉派陈明等同志来漳州闽南特委工作。特委又决定我去闽西迎接南昌“八一”起义军。九月中，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先后来上杭，要我和地方组织做支援大军的后勤工作，并要我们部署闽西各县的武装斗争。在“八七”会议、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等伟大事件的精神和实践的指引影响下，我们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四县采用建立农村据点包围县城的部署，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工作。于十二月间在漳州成立福建临时省委（后迁至厦门），陈明任书记，陈昭礼任组织，我任宣传。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我从闽西回厦门，省委推我任书记，陈明改任宣传。三月九日平和县农民以长乐乡为据点，在县委朱积垒同志领导下，举行攻占县城的武装暴动。这是福建省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炮。省委立即讨论和加强对平和和闽西各县的领导。

四月上旬，我和许士森、孟坚二同志为福建代表，动程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这次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并作出了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进行斗争的指示。

此后，刘乾初同志任省委书记。闽西在省委和各县委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罗秋天、阮山、陈正、曾牧村、蓝为仁、傅柏翠等同志领导下，龙岩、永定和上杭三县继平和之后于四、五月间先后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县联成游击区，成立闽西特委加强党的领导。后来，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闽西这一时期的斗争。

我于十一月由苏联回国到达福建福州，省委召开扩大会，由我传达“六大”决议，并决定我到厦门和前往闽西游击区进行传达。当时闽西特委召开扩大会，由我传达“六大”精神，随即讨论并部署游击区进一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我还由三县游击区到上杭和长汀两县城参加党的地下组织会议进行传达和部署工作。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下旬回厦门。刘乾初同志已调外省工作，我奉命接任福建省委书记。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其后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而开创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

的方向。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从三月中旬起三下闽西，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等部，并在上杭古田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使杭、永、岩游击区逐步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从此，闽西的武装斗争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但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诬蔑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什么“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为了实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下令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同时，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命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那时，出席上海苏维埃代表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长回来传达，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但我和王德同志等省委多数同志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发动武装暴动，也不同意把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进军东江，我们把意见上报中央，因而被指责为“右倾保守”，以后，我们虽然保留不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但由于省委执行中央关于成立行动委员会，在城市于夜间搞飞行集会等指示，犯了“左”的错误。同时由于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长回闽西传达中央关于闽西苏区划归广东，红军向东江出击的决定，结果红军出击三次，每次都受强敌截击而被迫后撤，使闽西苏区和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奉调去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正在这个时候，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立

三路线的旗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机构，成立了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从而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期。王明路线是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重复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和很快“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及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纲领。为此，要求“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实行总罢工，在苏区猛烈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以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这就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而提出的一条所谓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我到达上海时，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由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奇怪的是，他认为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错误，却指责福建省委在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威胁说不承认路线错误就不分配我的工作。

在这前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和红军，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二年春，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江西南部建立了以瑞金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临时中央却诬蔑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剥夺了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广东省委派邓发同志到闽西苏区传达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决议，并成立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同志任书记。四中全会后，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特委在第二

次反“围剿”中犯了分兵守口的错误，在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损失。特委和政府机关被迫从永定的虎岗撤退到上杭的白沙。我于一九三一年四月被派到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长，特委为保卫“虎岗”，决定派我到永定边区参加游击战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我和张鼎丞同志率领红军独立团在上杭、永定坚持游击战争。十一月间闽西主力红军攻占汀州后，根据中央苏区前委指示，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由卢德光任书记。在他假称奉中央命令出外联系工作带巨款逃跑后，前委命我接任临时省委书记。这时临时省委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以汀州为中心，西向武平扩大，东向连城、新泉扩大，北与宁化、清流连接，南至饶和埔游击区使闽西苏区扩大为十余县，并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成了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福建苏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我任省委代理书记，张鼎丞同志任政府主席。四至六月，闽西苏区又配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主力红军攻占漳州并胜利回师，这对巩固闽西根据地和为第四次反“围剿”作好物质准备起了重大作用。这时闽西苏区的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大军，疯狂地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主力红军迅速转到北线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后来独立第七师也奉命调往江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驻漳州的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很快的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并不断向上杭的卢丰、茶地、白沙等地攻击。而我们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因此，闽西的情况，尤其

是上杭、永定、龙岩边区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闽西苏区党和人民的面前。

正在这个时候，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斥的毛主席，在汀州傅连璋同志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他仍时刻关怀着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安危。那时，我因奉命随中央主力红军进攻漳州时跌伤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八月间得到好转后，毛主席就找我谈话。他总结概括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的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同志，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并决定我任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我离开期间，由刘晓同志主持省委工作。

我所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都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检查和部署了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同志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我们按照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经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们路经上杭白沙时，就指责我：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我说“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又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说没有听到传达。他们对此很不高兴，还问我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我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去年四月十四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没说完，他们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当时，我和许多同志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都很不理解。

他们到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由于缺乏地方武装独立团独立连的配合，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不应有的极大的恐慌，对这样改编地方部队的做法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主力红军确有困难。当时，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的敌人受了我们三次重大打击之后，遂集中几团兵力，三路配合进攻上杭的中心点白沙。我们按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照前次的经验，坚壁清野，暂时退出白沙。我们正在进行紧急动员，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加紧扩大地方武装，从四面包围白沙，打击敌人。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决心打击和迫使敌人退出白沙。我们召开县级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随后，我们又和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同志一起开会，总结贯彻毛主席指示五个多月来游击战争的胜利经验和分析当前斗争形势和任务。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里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边县边区参考。因此，会后我连夜赶写关于上

杭、永定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给省委。在此之前，我于一月廿一日亦到新泉了解情况，听知汀东的地主武装很猖狂，经常进攻苏区、还袭击我们长汀县委所在地河田。我从第四次反“围剿”的全局出发，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显然，这个报告和意见违背了王明“左”倾路线的要求，因而后来成了所谓的“罗明路线”的重要“罪证”。例如：我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开头就写明对杭、永、岩工作另作报告，只提出对汀、连工作的意见，要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目的分明：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击敌人的“围剿”；二是防止驻龙岩的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但是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硬说我“没有一句话说到了闽西原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说“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苏区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的”。为此，他们说我们“退却逃跑”！这完全是违反当时的事实，断章取义。这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到瑞金不久，中央特派员就到福建检查工作。他首先抓住我给省委的报告和意见，断定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直至红军长征，到遵义会议这一斗争才告结束。

二

什么是“罗明路线”？王明左倾路线把它说成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取消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歪曲和违反客观事实的左倾攻击；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我从当时福建

苏区的情况出发，为了贯彻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指示而采取的反“围剿”的有关措施。

为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我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二次写给省委的报告和所提的意见，以及当时闽西杭、永、岩反“围剿”斗争的实际情况。现在根据我的回忆，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我拥护、传达和贯彻毛主席为代表的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毛主席根据这条路线，总结三次反“围剿”战争经验，对第四次反“围剿”所作的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抓着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闽西杭、永、岩苏区于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路线的影响，采取“分兵守口”以致被迫退出虎岗，是绝对错误的。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运动战，在朋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

第二，总结五个月来在杭、永、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其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第一次由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第七师，集中优势兵力，夺回了被漳州和广东军阀占领的永定县城，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以后由县独立团配合地方武装，又打退了敌人对合溪的进攻；第二次，驻上杭县城的广东军阀以一个足团的兵力进攻白沙，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在距离白沙十几里远的山区荫蔽，晚上袭击进占白沙的敌人，使敌人吃坐不安，三天就退出白

沙，我们地方武装进行追击和沿途截击，敌人遭到重大伤亡以后，狼狈逃回上杭城；第三次，驻永定县城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营人，配合地主民团来进攻白沙，我们地方武装于中途利用地形伏击敌人，敌人死伤很多，只好从山路逃往龙岩。上列三次对敌人打击的胜利，使地方武装和广大干群受到鼓舞，使他们更加相信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威力，更加相信游击战争能够打击国民党十九路军，保卫杭、永、岩和牵制敌人向苏区内地进攻。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于猛烈扩大主力红军，迫得边区各县把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连人带枪编入主力红军，新的地方红军还未能及时成立，就在此时，敌人乘机向我们各边区进攻，致使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和恐慌。到了二月下旬龙岩和永定县城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和上杭县城的广东军阀部队配合，以几个足团的兵力向我们上杭县中心区白沙进攻，我们估计敌人较强，就照前次的经验退出白沙，县各机关退到上杭旧县，并动员地方武装包围白沙，向敌人袭击，决心不断打击敌人，迫使敌人退出白沙。当时我们上杭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开会总结游击战争经验和部署工作后，我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心的问题是要杭、永以及闽西党要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自然要配合其他力量），很艺术的来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要从这样胜利的（就是很小的胜利也是好的，只是要常常胜利）武装斗争中来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摧残和减少群众的痛苦，从这样的斗争中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要从这样的斗争中来发挥我们群众的斗争力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力量，来开展我们的斗争”；这是当时边区实际斗争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由于不加区别地在杭、永、岩搞“猛烈地扩大主力红军”，把地方武装整团整连整排连人带枪编入主力红军。赤卫队

一时得不到地方武装的配合，眼看着敌人对苏区的破坏，群众的生命财产、粮食和耕牛受到损失，而不能及时给予有效的打击。本来在游击区在敌人不断进攻的情况下，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是常事。但是由于以上原因，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应有的特殊恐慌，给我们的动员发动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认为，目前杭、永、岩党的最中心的工作，是动员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有效的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对斗争的情绪和战胜敌人的信心，才能使群众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我在报告中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很显然，这里所反对的是那种脱离客观实际，离开武装斗争这一中心的空谈，至于对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我是极为尊敬的。当然革命领袖也不是神，我们如果离开了客观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客观规律开展武装斗争。同样也不能获得成功的。

第四，在闽西的整个斗争部署上，提出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将新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的主力向北发展，用最大的力量，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连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向发展。这样，一是可以巩固闽西苏区的后方，威逼十九路军不敢向汀州、瑞金进犯，使中心区免受威胁；二是能够和江西的广昌，宁都一线的中央红军相策应和配合，牵制从北面向苏区进攻的敌人，三是能威逼和打击进犯新泉、汀连和上杭白沙的敌人。使杭、永、岩避免陷于孤立，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顾此失彼，暴露弱点。此外，这一带

团匪的力量较弱，目前还没有得到白军的配合，容易消灭，在斗争中，可以使这一带的地方武装得到锻炼，增强战斗力，以便很快地能与来犯的白军打仗，而且可以及时做好应付敌人进攻的群众发动工作。如果失去这一有利时机，这一带团匪得到了白军的配合。就会在我们的后方和侧翼进行捣乱，增加我们的困难，象过去那样处于慌张应付的状态。

第五，各边区在开展游击战争中，地方武装要有骨干队伍为核心，并使他们多参加实际作战，从作战中锻炼。苏区内地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和比较能打仗的部队一起参加战斗，通过实践来学习战争的经验。要向外推进，先抓住较弱的团匪进行打击，然后就能更好地同白军作战。不估计地方武装的力量，一开始就硬打强敌是错误的。

第六、在扩大红军方面，要加紧动员迅速造成能战的主力，使目前两个师扩大成三个师。但扩大主力红军，边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应以长汀等苏区内地为中心和重点。因为长汀等县是新区，人口多，目前还没有与敌人直接作战，有利于进行动员扩大主力红军，请省委抓紧时机进行动员，多帮助长汀等县进行这一工作。至于边区边县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扩大主力红军比较困难，特别是杭、永、岩是老区，于一九二八年夏秋间就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三县游击区，在长期斗争中，绝大部分青壮年已参加了红军，一部分青壮年和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也参加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和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此外，是老弱妇孺。在敌人进攻和摧残下，很难大规模地扩大主力红军，但群众愿意参加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这些边区边县应先抓紧时机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它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从地方武装中逐步抽调力量去

扩大主力红军就比较容易了，但不能再整团整连的连人带枪硬编。总之，我们上述的做法是适应目前群众斗争的情绪和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第七、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对各县区的工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整个任务，要找到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领导作用。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等具体情况，找到各县区的具体任务。过去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采取一样的方法，一样的计划，特别是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地上下层讨论，简单地作政治动员，机械地分配扩大红军的数字，这是不好的。后来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极少成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82页）这说明当时的工作方法是要大大改进的。

第八、在财政方面，杭、永、岩边区是游击战争环境，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有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人员的生活就无法维持。

上述报告和意见，是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例如，当正确贯彻毛主席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的时候，上杭、永定、龙岩老区的形势就不断好转；而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不考虑边区的战争环境，把地方武装硬改硬编入